

世界摄影大师经典

# Robert Capa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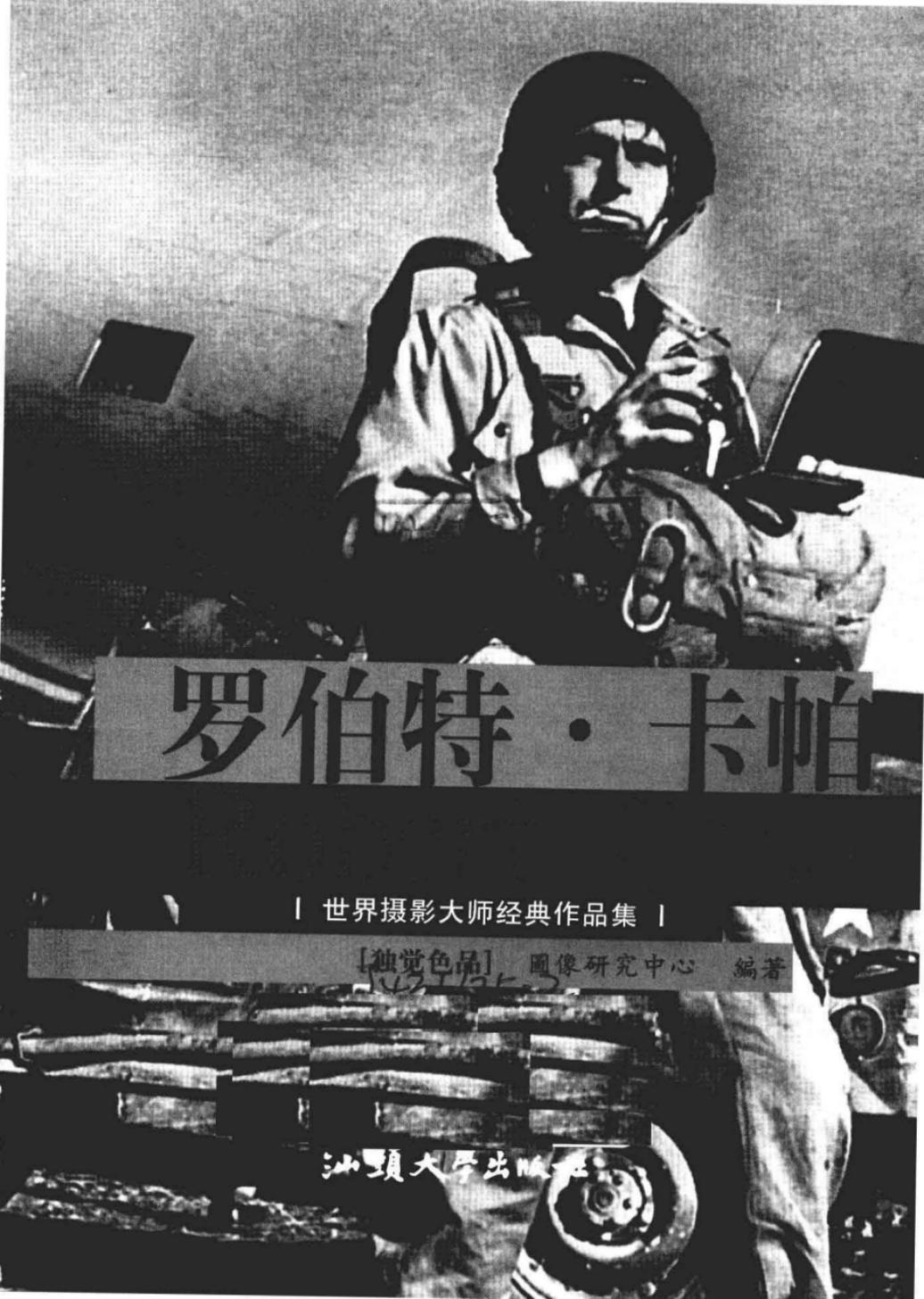
## 罗伯特·卡帕

视觉色品图像研究中心 编著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



# 罗伯特·卡帕

| 世界摄影大师经典作品集 |

【独觉色品】 图像研究中心 编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 罗伯特·卡帕

---

编 著 / 独觉色品图像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 胡开祥

封面设计 / 郭 炜

设计制作 / 北京时代印象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责任出版 / 林 琦

责任技编 / 姚健燕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 30 千字

开 本 / 787 × 960 1/32 印 张 / 3.75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5000

定 价 / 全套 100.00 (共 5 册), 本册 20.00 元

ISBN 7-81036-954-7/J · 72

---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5 室

电话 / 020-85250103 传真 / 020-85250103-6001 邮编 / 510075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 3833 传真 / 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  
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



## 卡帕：我是一个赌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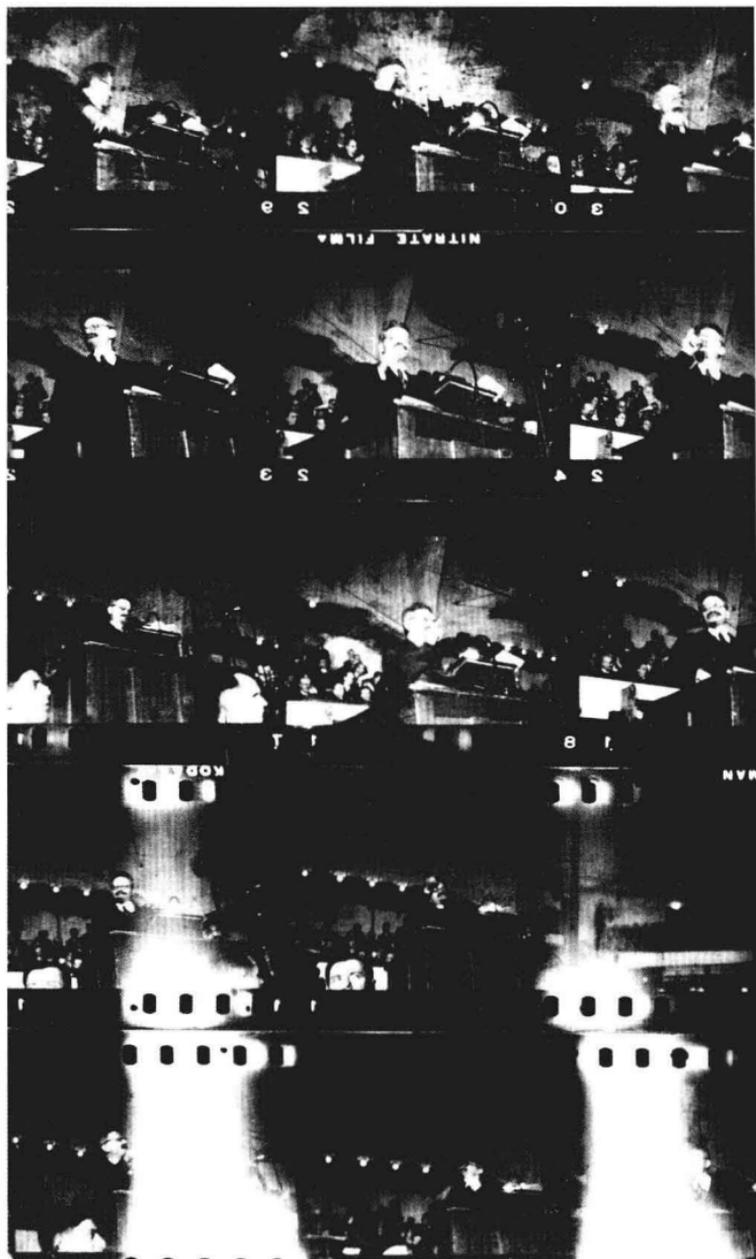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匈牙利人，1913年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Andro Friedmann)。卡帕是他后来用的笔名。

1913年10月22日，弗里德曼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父亲是犹太人西服店的老板。1923至1931年期间，他在布达佩斯的伊姆雷·马达克斯中学读书。17岁时，他对摄影发生了兴趣，开始学习摄影的一些基本技术。这一期间匈牙利国内动荡，弗里德曼和许多青年一样热衷于政治活动，并开始频繁地参加一些社团聚会，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但在一次加入社团的入会仪式上，他却突然改变主意，转身离开了。尽管如此，弗里德曼还是被当局的秘密警察盯梢跟踪，家人也被调查盘问，弗里德曼只好偷渡出境，流亡德国。这一年是1931年，弗里德曼18岁。

1931至1932年间，他在柏林的德意志政治大学学习政治学。结业后，利用自己学过一点摄影的特长，在柏林的德意志摄影服务社当一名暗房助手，同时开始出入各种场合，到处去拍那些名人活动的照片。他发表的第一张照片是列昂·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为大学生演讲的图片。幸运的是，有关这张图片的胶卷还在。从胶卷的印样中可以看到，此时的弗里德曼已经显示出，他对处于运动中的人物的高峰状态有极强的预见能力和影像控制力。这一天赋在他以后的摄影活动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构成了他的照片最具魅力部分。

1935年，弗里德曼到达巴黎，并认识了她的西班牙籍女友盖尔达·塔洛(Gerda Talc)。不久，他认识了在那里的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大卫·西摩，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与他们共同使用一间暗房，靠摄

卡帕于丹麦的哥本哈根拍摄的列昂·托洛茨基为大学生讲解苏联革命历史的胶片印样。卡帕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拍摄过程：“托洛茨基讨厌别人为他拍照，尽管从全世界来了很多带有大型照相机的摄影记者，但谁也没能进到会场里去。我口袋里装着一台小得谁也不会认为我是摄影家的小型照相机。当几个工人往会场运钢管时，我混在他们中间进去，用照相机拍摄下来。”（1932年11月27日）





影为生。不久，又成立了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富有的摄影家罗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里德曼负责外出拍摄照片，女友塔洛则负责到各个报社和杂志社去推销照片，并宣称这位“卡帕”先生自美国来到巴黎旅行，并不靠照片生活，所以每张照片至少要150法郎。这个价码是当时图片行情的三倍之多。而对美国的新闻机构，塔洛则说“卡帕”是巴黎的著名摄影家，有大量有关欧洲的精彩图片可以供稿。靠了塔洛的推销技巧，当然也是因为这些照片拍得太好了，这位“卡帕”先生的照片被一组一组地卖了出去。连《巴黎竞赛画报》这样极有地位的杂志也发表了“卡帕”的一组空降兵的图片。一时之间，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重要报刊都争相购买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著名摄影家”的精彩照片。赚回了大把法朗和美元的“卡帕”，日子开始好起来。

不久，在日内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发生了暴动事件，各地记者手持大型新闻相机蜂拥而至，却都被警察挡在了外边。惟有弗里德曼混了进去，并用不起眼的小型莱卡相机拍到了会议独家特写照片。这一幕被在会场中的欧洲《观察》杂志图片总监沃戈尔（Lader Vogel）看到。三天后，这些照片放在了沃戈尔的办公桌上，塔洛在电话中对他说：“卡帕先生的这批独家照片，一张要300法郎。”沃戈尔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再给我提什么卡帕的事。让那个穿着脏皮夹克到处乱拍的弗里德曼，明天早上9点到我的办公室上班。”

安德烈·弗里德曼不得不以“罗伯特·卡帕”的名字正式出现在各个重要的新闻场合。1936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内战。卡帕和女友塔洛一起来到西班牙战场，手持相机在炮火中穿行，携手报道那些在战乱中生活的平民和战场上的士兵。一天，卡帕正在第一线的战壕中，一名战士跳出战壕，准备向敌人发起冲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在他将要倒下的一刹那，卡帕按下了快门。这幅《士兵之死》的照片迅速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作为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图片，《士兵之死》让人们重新考虑西班牙战争的性质及意义。卡帕当然因此而名扬天下。他对运动中的事物处于高峰状态的影像捕捉能力彻底征服了那些苛刻的图片编辑们，他的照片开始成为许多报纸和杂志争相购买的目标。

不久，在一场战地采访中，他的女友塔洛不幸死于坦克的履带之下。眼看着女友死于非命而不能假以援手，这让卡帕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沉默寡言、意志消沉。塔洛的死让他充分地意识到战争的愚蠢



列昂·托洛茨基在丹麦哥本哈根为大学生讲解苏联革命历史。这是卡帕发表的第一张图片。(1932年11月27日)

和荒唐，也让他明白应该用他的摄影去为人们做些什么。他在出版的《西班牙内战》一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塔洛，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从此，卡帕成为一名专门表现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和残酷战争的摄影家，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1937年，世界各地的战事骤起。第二年，卡帕来到中国，并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约定一同赴中共所在地延安采访。但是到了西安，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他是抗日战争中惟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滞留上海、江苏、湖北等地的卡帕，拍摄了大量在战火下生存的平民生活的照片：那些在艰苦条件下求学的小学生，那些在空袭下惊恐的市民们，那些扒火车逃难的人群，那些家园毁于战火的掩面哭泣的老妇人，甚至那些在战争

阴云之下躺在公园里的清闲的养鸟人，等等。

1939年，卡帕回到欧洲，然后再次访问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1941年，他受美国《生活》杂志和《柯里尔》杂志的委托，作为他们的特派摄影记者，跟随盟军进入北非、意大利等地进行战地采访。频繁的战役让卡帕应接不暇。他随盟军到处征战，他背着伞兵包和盟军士兵空降在敌人后方，他甚至参与巷战，与炮火赛跑一样地按动相机的快门。他拍下成群的敌军俘虏，拍下缴械投降的敌军走出碉堡，拍下空降中摔死的战友，拍下在阳台上中弹牺牲的盟军机枪射手。他拍的胶卷往往都来不及冲洗，就随美军运输机空运回美国，再由《生活》杂志社的暗房师傅冲洗放大，然后迅速出现在《生活》杂志上。

他常常要在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看到发表在杂志上的自己的照片。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声名远扬，成为了各大媒体追捧的明星。他从不考虑这些。他已经享受过荣耀和声名，他只想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投身到战火深处，看看那些愚蠢的人们是如何发动了一场愚蠢的战争，而在这场愚蠢的战争中人类如何经受了巨大的苦难。正如他所说：“我认为战地记者比起军人来，更能获得较多的酒、较多的女人，较好的收入以及较大的自由，然而就这场游戏而言，拥有选择立场的自由，且被准许做个不受制裁的懦夫，却能叫一个战地记者备受折磨。战地记者的生命是操在自己手中的。他可以押在选定的赌注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把它收回口袋里。”

1944年，他随盟军从诺曼底登陆，进入欧洲大陆战场。他拍下的盟军从诺曼底登陆的胶卷空运回美国后，已经筋疲力尽的暗房师傅不慎把胶卷烤糊了，残余的几帧底片，让我们看到了在黎明时分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如何英勇地发起滩头冲锋。尽管相机因晃动和对焦不准导致影像模糊，但那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像，还是让世界看到了战争的冷酷和惨烈。卡帕一路拍到巴黎，他不仅拍下人们在胜利之时的狂欢喜悦，也拍下了那些与德军生下孩子的法国女人被剃光了头在街上游行示众。他不仅看到了战争如何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也看到了战争是如何摧毁了人们的良知和心灵，把人们的内心变得黑暗和冷酷。他客观地记录下人们所做的一切，但他从那些人对敌人施行的恶作剧式的报复中看到了人性的恶，看到了另一种战争的开始。他几乎不在照片中作任何的评价，但



1944年，卡帕在欧洲随突击队的士兵空降到战场上作战地摄影报道。这是他登机前留影。卡帕在日记中写道：“我与编队长官登上同一架飞机。我被指定为第二个离机跳伞的人。紧随编队长官之后。登机后我读着一本小书。10点15分，我刚刚读到第67页时，红色信号灯亮了，这一刻我突然产生一个愚蠢的念头：‘我不想跳了，我想把书看完。’但我还是站了起来，确认一下相机是否绑在我腿上，胶卷是否在我前胸的口袋里。绿色信号灯亮了。我随士兵跳出了飞机。在我落地之前，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我们都平躺在地上没有人想站起来。第一步行动成功了。我们开始进入第二步行动。10多码外是一片高大的树林，不少在我后面跳伞的人都被挂在50英尺高的树上，被德军打死了。我们终于占领了莱茵河西岸，但这比诺曼底行动要容易得多。”



玛格南的成员在一起。从左到右：卡帕、皮尔加萨门和恩斯特·哈斯在巴黎  
1950年



大卫·西摩和卡帕在一起。1952年布列松摄。

我们会看到他内心升起的一种悲哀和荒凉。

二战让卡帕几乎变成战地记者的代名词。但他并没有止于此。1946年，他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1947年，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平静时光里，卡帕和几位好友：布列松、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等一起，成立了一个图片代理机构，一方面吸引那些世界一流的摄影高手，到处去拍摄采集重大的世界性事件的图像；另一方面，则以机构的形式，去与那些巨额商业资本支持运营的传媒打交道，抵制那些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改变图片的客观真实性的做法，维护新闻的公正，并努力保障摄影记者的基本权利。一大帮朋友在一家酒吧里聚会时，卡帕随意地用一种两夸脱灌装的大桶香槟酒的名字“玛格南”（MAGNUM）为图片社命名，并在大家的推举下，成为这家图片社的第一任老板。

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卡帕达观热情的个人秉性，女友在西班牙牺牲后对他带来的刺激和影响，造就了他于世事练达而不乏虚无之感的处世观点和态度。他像赌徒一样去工作，主张尽可能地靠近事物去获取最具张力的图像，但他并不在乎图像本身的素质和炫人眼目的花哨技巧，他的照片显露出一种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所以没有人会在乎他的照片表现得不够精致，裁切得不够紧凑，快门不够准确，调子不够丰富。他最出名的照片《士



从左到右：大卫·西摩、  
罗伯特·卡帕、毕索夫  
巴黎 1947年

兵之死》，图像焦点不实，品质极差，而那幅《诺曼底登陆》则简直就是模糊不清。那些属于摄影本身的技术指标，那些在他人看来代表着图像的基本质量的诸如焦点、构图、反差等等视觉元素，对于卡帕简直就没有什么意义。卡帕其实是建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摄影观念，那就是图像的内容永远比它的形式更本质、更重要。而对于战地摄影这种非常态的摄影环境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卡帕的观念可以看作是战争摄影的美学。我们在这种图像的美学中，不仅看到了无数震撼人心的动态事件，我们还会看到无畏和勇气、忠诚与信念、良知和责任，以及对自身生命大踏步的超越。

这一摄影观念极大地影响了被吸引到玛格南来工作的许多优秀的摄影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玛格南图片社秉承的一种传统。我们在卡帕之后的唐·麦库林、纳赫特威等等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的摄影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和延续。这一传统与以布列松为代表，以马克·吕布、库德卡、英格·莫拉奇等人为后续传承的图像美学——注重摄影的视觉构成和基本的语言素质，关心图像的自身大于关心图像承载的内容——的传统，形成了玛格南图片社极为重要的两种摄影观念和从业人群：卡帕代表了直入事物核心的那种果敢、勇气和献身精神，赋予摄影以极大的视觉震撼力量；而布列松则代表了摄影语言的精粹、准确和完整高贵。这使玛格南在以后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有两条

线索，它们互相补充和丰富。正是因为这一点，玛格南图片社直至今日，仍然成为全世界摄影师神往的一个工作机构。

可以想到的是，这两种思路的摄影师相处是如何的艰难。又加上参与这个图片社的摄影师都是些才华横溢个性极强的家伙，虽然可以奔赴世界各地去获得大量极有竞争力的图片，但却不擅经营，经常搞得图片社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草创阶段，卡帕经常得靠赌马来周转员工和同仁的薪水。幸运的是，卡帕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刻赢得最后一局。这种状况直到卡帕的弟弟康奈尔·卡帕执掌经营大权之后才得以好转。

战后的卡帕依然奔赴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图片。从1948~1950年间，卡帕记录和报道了以色列的建国；他到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报道那里的人们战后的生活。1954年，他到日本旅行，记录和报道了战后的日本：那些在街头乞讨的残废军人，那些在神社中祈祷的老人，那些在公园里度周末的一家人，等等。此外，他还记录了身边的朋友，那些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生活：画家毕加索、马蒂斯、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卡波特、演员汉弗莱·鲍嘉和深爱卡帕的好莱坞大牌明星英格丽·褒曼。战后平静的生活，让长期处于战场炮火之中的卡帕享受到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

但世界并没有因为二战的结束而减少动荡。新的地区性武装冲突和战争时有发生。1954年，卡帕再次进入战争状态的印度支那，报道法军在印度支那发动的局部战争。像过去一样，卡帕沿途记录了越南、老挝各地平民的日常生活，那些穿过河内大街的孩子和法军，那些死于道途中的孩子，那些失去亲人在墓地哭泣的妇人。

1954年5月25日，幸运地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役，拍下了无数震撼人心的战争图像的卡帕，在随法军转移的途中，不幸踏中了地雷。与他同去的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记者约翰·麦克林，曾经对一位为马格南作传的作者详细叙述了卡帕牺牲的经过：

我与卡帕来到法国殖民地红河三角洲进行采访，这里驻扎着雷金·科戈理将军的部队，他是驻扎在北越的法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天，当一支2000人的部队即将与河内以南50英里处的驻军换防时，我们跟随部队准备撤离。在距度山

约200米的时候，队伍被北越伏兵包围了。

我们撤进了野地里，开始向战区指挥官金·拉卡彼勒中校了解情况。卡帕问：“情况怎么样？”中校回答说：“越南人出来了。”毒热的太阳烤着大地，到处都在开火：法国大炮、坦克、迫击炮在我们后面，在我们左面约500米处是一个丛林环绕的村庄，轻武器在丛林中不停地射击。右前方约500米远的另一个村子里，轻武器射击的声音与炮弹的爆炸声混成一片。不时有零星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

一名年轻的南越中尉向我们走来，用不很流利的英语与我们交谈，“先生，你怎么样？”“我很好。”卡帕很不耐烦。他对那个中尉说：“我到周边看一看。你们走的时候叫我一声。”此时是下午2点50分。中尉改用法语与我们交谈，并问我们是否喜欢越南。2点55分时，不远处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烟雾升腾。都以为是法国人正在搞爆破。中尉问：“原子弹爆炸是这个样子吗？”卢卡斯说：“这可是卡帕最想拍的画面。”



卡帕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军队在荒地里搜索前进。（1954年5月25日）

几分钟后，一辆法国坦克在我们的后方开火，炮轰左边的村子。

3点05分，摩托化步兵开始在稻田中向前推进。一名戴钢盔的士兵跑过来用越语向中尉报告时，我正在作笔录。中尉用没有一点感情的语调说了一句话。我懂得他所说的那个单词的意思，但没听懂整个句子。“请再说一遍。”中尉又用同样的语调重复了一遍这个句子。

这一次我听清了，但我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笑着对卢卡斯说：“这小子告诉我说，卡帕死了！”中尉仍然面无表情，他用法语拼出一个个的英文字母，那是“死亡”。

这时，另一个南越人跑过来直接对我招手，叫我过去。中尉向他询问后说：“也许不是死了而只是被迫击炮炸伤了。”卢卡斯和我跳了起来，跟着士兵沿着壕沟跑过去。在拐弯处，士兵给我们指了指方向就跑开了。

我们爬上公路，然后进入一片凹地。在一条路上，卡帕仰面躺着，被炸成粉碎的左腿的残余部分立在地上，像是从地下长出的一只脚。他胸部也严重受伤。照相机还紧紧攥在他的左手里。我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他的嘴唇轻微地颤动，仿佛睡梦中受到惊扰一般。

这是他最后的动作。时间是下午3点10分。不一会，雷鸣般的爆炸声在我们上方的公路上响起来。爆炸的气浪将越南士兵们掀进了沟里，但没有人受伤。推土机又排掉了另一颗地雷。这是一些杀伤性极强的地雷，卡帕大概就是踩在了这样的一颗地雷上。

中校拉卡彼勒下令继续前进。他命令一辆救护车将卡帕送到5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去。到那里时，一个越南医生用手摸了摸他，就说，“他已经死了。”他问我：“这是第一位在印度支那半岛死掉的美国记者吗？”我点点头。他说：“这种让美国人获取新闻的方式也真是太残酷了。”

他的那架炸飞了的莱卡相机里拍下的胶卷依然完好无损。最后的一张照片，是军队在荒地中前进的情景。

这一年，卡帕41岁。

卡帕生前获得过许多重要的奖项。1947年，他以自己卓越的摄影成就荣获